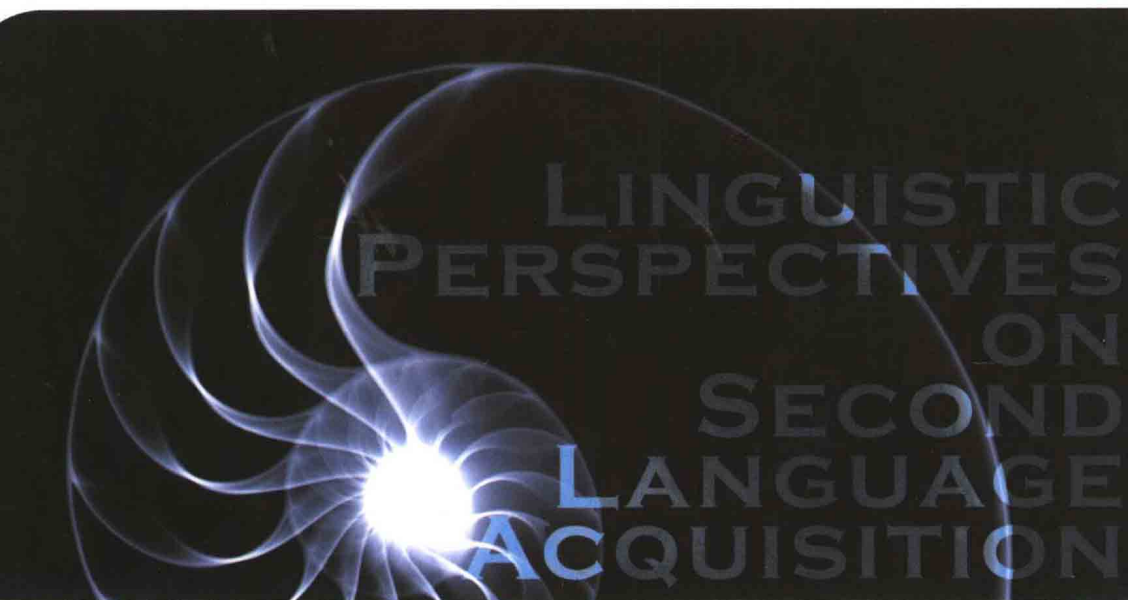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usan M. Gass, Jacquelyn Schachter / 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应用语言学视野·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

Susan M. Gass
Jacquelyn Schachter 编

戴曼纯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 =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美) 盖斯 (Gass, S. M.) 等编.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 12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第二语言习得前沿书系)
ISBN 7-5062-8214-3

I. 第... II. 盖... III. 第二语言—研究—英文
IV. 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3282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1989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本书最早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1989 年出版

本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elsewhere.

本版仅限于中国 (不含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境内发行和销售。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编 者: Susan M. Gass, Jacquelyn Schachter

导 读: 戴曼纯

责任编辑: 梁沁宁

装帧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世图印刷厂

开 本: 711 × 1245 1/24

印 张: 14

字 数: 455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2-8214-3/H·893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6-075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正在策划引进一系列的国外语言学学术专著，其中包括“西方应用语言学视野”丛书。他们延请了各路造诣很深的专家教授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智囊团”，从遴选书目到撰写导读，都为这套书献计献策。他们想让我为这个系列写几句话，于是我就认真地翻阅了即将付梓的首批专著，印象不错，就写了这个所谓的序。

在此之前，世图北京公司已经引进了国外学术刊物，其中包括语言学期刊。翻阅这些专著和刊物时，我想到了两点。第一，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和知识的可获性，对国民经济和民族素质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学者到欧美留学时，往往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国外大学不仅图书资料几十倍或几百倍于国内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学术刊物的种类之多和旧刊之全也是国内大学不能相比的。我看，大量引进国外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有利于为我国的学者提供完备和最新的信息资源，有利于为国内培养出一流的研究者，同时，也有助于为我国大学图书馆逐渐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创造条件，有利于营建品味高雅的文化氛围。第二，投身学术之路，一般都是先读教科书，再系统地读专著，然后定期地读学术期刊。专著和学术期刊是做科研和写论文须臾不可离的。专著使我们了解学科的发展历程，系统理解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期刊使我们及时知晓学科的前沿，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这套开放性丛书的推出，实则为我国语言学研究人士“拿来”国外的最新理

论和方法，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从而能够建立中国广袤土地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

被经典著作、精品图书和权威期刊所包围，犹如与学术大师亲密接触，除了倍受激励，决心奋起直追以外，似乎还可以净化灵魂，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中国图书市场上，许多产品过于商业，过于功利，过于垃圾。铺天盖地的粗制滥造的英语试题就是一例。这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不利于人文的教化与性情的陶冶，更不利于可持续性教育。这样的文化风气迟早要改变。

引进国外名著的重要性，我在二十年前就有所察觉，我曾为我们办的研究生班胶印过部分语言学专著。那时还没有版权问题。虽然那只是“小打小闹”，但得到书的那二百多位学生都受益匪浅。接着，我又主编了《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让学生有机会领略语言学大师们的风采，也收到良好的效果。今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大批引进语言学专著和学术刊物，必将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

序

继国内几家著名的外语出版社引进语言学原著系列之后，2006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精心策划了反映国外二语习得研究与教学最新学术动态和成果的丛书系列。这套开放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前沿书系，旨在精选国外最新出版的研究著作，涵盖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理论、二语认知、二语语用、阅读、写作、听说、学习策略、学习者语料库、研究方法等各个领域。作为一位始终研究和关注二语习得的学者和教师，我心中充满喜悦和感激。高兴的是，有像世图北京公司这样的出版界有识之士，高举追求学术真知的旗帜，捧一颗真心弘扬学术，回报社会；感激的是，全国的广大外语师生又可以及时补充到学术营养，将最新的外语教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应用到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中去。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国外的最新动态来看，二语习得研究清晰地表现出认知和社会文化二分的路径。

心理认知过程与机制在二语习得的研究伊始就受到关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则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语言。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都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已经成为主流观点（DeKeyser & Juffs, 2005）。Hinkel（2006）及一些学者认为，二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认知过程，其研究的焦点就是描述并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二语认知路径的发展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开始，

到后来的交互论 (interactionism) 和连接主义 (connectionism), 直到近来出现的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s), 认知的视角在 SLA 研究中十分清晰。

近年来兴起的构式语法理论认为: 1) 语法知识的心理表征由形式-意义配对 (或称映射) 即构块组成, 意义与形式不可分离。2) 意义与形式相互约束, 构块的意义并不对应于构块中所有词汇单位的意义总和。3) 语言具体化单位和图式化是语法知识及其习得的基本组织原则。高度图式化 (highly schematic) 的构块也具有图式意义。4) 语法知识, 又称句法-词汇连续体, 是有组织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构块。5) 组成一系列语法知识的构块, 既有很具体的只适合于一种情形的, 也有较为抽象, 可涵盖大范围的用法事件 (usage events)。习语构块 (idiomatic construction) 与普通构块 (general construction) 没多大区别。构式语法在解释二语习得时强调, 语言是个由构块组成的系统, 所以二语习得很大程度上就是构块的习得, 遵循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式习得顺序, 从使用范围局限的构块类型开始习得, 通过机械记忆学会较为具体的语言结构, 过渡到较为抽象的、表达性强的题元结构。这些结构都基于各类语言范畴、图式和构块。二语习得研究也证实, 二语习得从习惯用语开始, 遵循“惯用语→低域模式→构块”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Doughty & Long, 2003)。

与认知视角相对的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 代表性理论有维果斯基 (Vygotsky) 的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语言社会化学说 (language socialization)、巴赫金 (Bakhtin) 的对话理论 (dialogic perspective) 以及批评理论 (critical theory) 等。

社会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原则是: 人类认知的媒介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如工具、符号系统 (尤其是语言), 以及社会交流。交流本身通过语言实现。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观

点可以概括为：1) 一切复杂心理活动都是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2) 心理机能最初存在于人际间，随后逐渐成为内部的心理机能；3) 心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掌握凭借词语传递的全人类经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交流在认知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它不仅仅将交流看作是习得词汇及形态句法的手段。交流既是二语学习的工具，同时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有重要启示，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研究，都是研究真实的课堂以及其他社会场景里的语料。其次，由于社会交际是学习的主要途径，所以学习者参与的交流尤其值得关注。再次，社会文化研究大多采用微变化分析（microgenetic analysis）方法，开展跟踪研究，观察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状况。

与社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的语言社会化理论也认为，在任何环境中，语言学习者都处在一种由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塑造的交际环境中，通过学习成为其中有能力的参与者。这些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将会影响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既是社会化的方式，又是社会化的中心目标。语言资源及交流实践在语言社会化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初学者了解社会集团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以及学会认识和表达情感的途径。

Bakhtin 的对话理论进一步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当我们把他人的话语变成自己的用法时，也就形成了与他人的对话关系，对话论强调智力过程（intellectual process）具有社会性，话语的构建和话语中前后表达的衔接需要说者和听者共同参与。因此，我们日常使用和学习的语言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相反，语言的使用是我们对他人语言的借用。语言的学习就是学习者试用他人言语的过程，语言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表现说话者对其他话语参与者的态度，表明说话者

在交际中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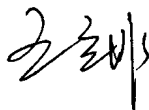
概括起来，二语习得认知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二语学习的看法不同和对二语习得理论的构建不同。坚持二语习得认知观的学者（如 Kasper, Gass, Long）等都认为，虽然社会环境能够影响第二语言习得，但是 SLA 本身实质上的确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持批评观点的学者（如 Kramsch, Larsen-Freeman）则认为，二语学习不是一种孤立、脱离语境和语言使用的状态。认知视角过分强调个体和内心思维过程以及语法能力的发展，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意义是交际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交互性，超越个人的意愿和行为，不考虑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文化视角和认知视角之间的一种失衡。在二语习得理论构建方面，一些学者提出理论和标准的一元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坚持实证主义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唯一范式，认为多元化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多元并存会带来问题，多种理论的存在和多重标准等于无理论与无标准。但相对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现实本身就是多样的，科学并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所有具体问题，提倡“后现代主义批评分析”，反对实证主义霸权，鼓励“百花齐放”，避免理论受阻，导致不同声音的消失。

当前，双方都承认分歧存在，虽然争论还在继续，但认知理论与社会文化理论仍有望走向融合。

目前，国内还没有引进过以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专题的大型丛书。世图北京公司组织的这套丛书旨在组合国外多家著名出版社的代表作，对各派观点和理论兼收并蓄，使我们能对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综览。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而编写的导读也推陈出新，除对著作的重要观点和思想逐章归纳之外，就各本著作所涉及的领域都有一个国内外发展现状的概述，对该著作和作者在该领域的地位也加以阐述。导读之后还列举出国内近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让读者可以轻松得到国内研究资

源的连接。此外，撰写导读的作者全都是国内研究二语习得的专家，他们研究成果丰富，视野开阔，充满学术的朝气。

这套丛书在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广大外语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和相关研究人士，以及对二语习得研究和外语教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这套丛书对推动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和改革，提高广大外语师生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将起到重要作用。我极力推荐这套丛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 DeKeyser, R. & A. Juffs. 2005. Cognitive considerations in L2 learning.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 437-45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Doughty, C. J. & M. H. Long (eds.). 2003.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 Guiora, A. Z. 2005. The language sciences – the challenges ahead: a farewell address. *Language Learning* 55(2): 183-189.
- Zuengler, J. & Miller, E. 2006. Cognitive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Two Parallel SLA Worlds? *TESOL Quarterly* 40(1): 35-58.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导读

戴曼纯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分野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语言行为涉及多少学科就会有多个不同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教育学(包括教育心理学)视角、心理语言学视角、神经语言学视角、社会语言学视角、语言学视角等,它们都能探讨二语习得的本质,包括外在因素、内在过程和知识表征等。

仅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二语习得研究角度与语言学流派一样多,例如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都为二语习得提供理论框架或背景。二语习得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不同研究角度,是因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极其复杂,其复杂程度绝不亚于语言本身。也正因为研究角度不同,采用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在理解、接受、综合应用其他流派研究成果的时候出现交流上的困难,甚至出现不应有的偏颇。国外曾有学者编辑出版过两本影响颇大的二语习得研究概览,对全面了解主流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和思想极有裨益,一本是 W. C. Ritchie 和 T. K. Bhatia (1996) 主编的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另一本是 C. J. Doughty 和 M. H. Long (2003) 主编的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前者注重介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后者偏向认知。

二语习得研究缘起于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倚重已经使其不可能只局限于解决实际问题,还需要探讨不一定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例如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可及性问题。虽然二语习得研究发展了几十年,但还只能算得上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和语言学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在生成语法、功能—类型学、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二语习得研究依然是该领域的主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涉及第二语言学习的有关研究受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试图找出语言学习的法宝,例如通过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预测语言学习的难点,然而,预测的失败和解释的无能使对比分析失去了其揭示二语学习本质的价值和吸引力。七十年代,对比分析被起源于六十年代的差错分析(Error Analysis)取而代之,差错分析试图找出语言学习中的策略、产生错误的原因、弄清语言学习中的常见困难以便促进教学,但是,差错分析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对差错的归类和归因不尽人意,例如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简单化(simplification)、发展性差错、交际策略造成的差错、诱导性差错、回避类差错、过度使用型差错等分类涉及到差错分类、差错产生过程、差错原因等不同方面,往往难以决断。到了七十年代末,差错分析又被中介语(Interlanguage)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取而代之(Richards & Schmidt, 1992, 2003)。

自六十年代开始,Chomsky 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其对语言的哲学认识和研究方法论的思想)渗透进许多学科领域,二语习得研究也不例外。按照乔氏的语言心智观,语言学应该探索构成语言能力的潜在语言知识,而不是外在的语言运用。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二语习得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将二语习得过程与第一语言习得对照观之;以具体语言结构作为研究内容,尤其是著名的语素习得顺序研究,不同研究结果导致了一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等同论、相似论、差异论的产生。Chomsky 思想的影响也催生了二语习得研究重要理论术语的出现,例如中介语、过渡性语言能力、习得顺序、普遍语法可及性等。八十年代,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框架影响着一语习得研究,由此也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将二语习得研究引向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证探索。在原则与参数体系下,一语习得者通过接触到的具体语言输入设定语言的参数值,一语输入受普遍语法引导,形成具体语法,例如约束原则(Binding)、邻近原则(Subjacency)等。

这一构想与语言习得的逻辑性问题是分不开的,即儿童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习得如此复杂的语言系统,如果没有内在的、潜在的知识作指南,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此项任务的。当然,将一语习得研究思路、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二语习得中,是不是有问题,目前

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毕竟成人习得二语时已经掌握了母语，习得者的普遍语法已经起过一次作用，其认知水平、心理和生理与儿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纷繁世界的无穷烦扰，成人还能像儿童时期那样悠然自得轻松自如地习得一门新语言吗？在评价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语言”的具体界定。对大多数二语习得者而言，一语和二语的最终整体造诣总是有些区别的，多年留学国外也不见得能彻底摆脱母语在发音上的影响，尽管第二语言某些核心部分（如语法规则）的掌握可能达到本族人的水平。

然而，二语习得研究中只研究语言之间相通的部分是不够的，许多更高层次的知识、非核心部分的语言知识都有研究价值，因而也需要不同的研究角度。以 Greenberg (1966), Keenan 和 Comrie (1977) 等为代表的语言功能—类型学视角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立在跨语言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语言共性论述被应用到二语习得研究，例如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和标记 (Markedness) 理论。无论是原则与参数体系下的实证研究还是功能—类型学框架下的实证研究，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二语习得过程和二语知识表征，尤其是二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人二语习得者的中介语是否表现出二语本族语者相同的规律性，或者说成人二语习得者是否依然可以利用普遍语法构建第二语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批学者（如 McLaughlin, 1978; McLaughlin et al., 1983; Bialystok, 1978, 1982）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论述二语习得过程，把二语习得看作信息处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语言的发展与其它非语言技能的发展被打上等号，二语习得者就像一部学习机器。语言结构的掌握程度就是其信息处理程度，是需要学习者注意的控制过程 (controlled process) 还是无需注意的自动处理，学习者从注意语言结构知识到控制性处理，通过不断操练使知识熟练成自动化知识。从这一角度看二语知识，还可以将其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前者指以命题形式储存的、有意识的事实、概念或思想，例如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的 -s；后者指我们知道如何实施但是并不有意识知道的那种知识，这种知识通过操练获得。从认知角度论述二语习得的还有 Bates 和 MacWhinney (1981), MacWhinney (1987) 的竞争模式 (the Competition Model),

该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形式的有效习得不可能不参照其功能,语句的处理就是句内成分关系的处理,依靠识别句子内的语序、曲折变化等线索(cues),而线索有显著性之分,对确定句内成分起着不同的作用。二语习得可以看作从一语体系调整至二语线索体系。

稍加比较,我们能看出普遍语法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的是学习者某一语言能力状态下的知识特点,对知识如何达到此状态这一问题没有进行正面回答,而认知角度的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知识(信息)的处理过程和发展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两种视角是互补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另一种二语习得研究思路从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学角度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考察第二语言的可变性(variability),这一视角被统称为可变论(Variationist Approach),如 Tarone (1983) 和 Ellis (1985) 的相关研究。第二语言的发展既有纵向的发展变化,也有横向的使用变化。Ellis (1985) 认为中介语的变化有两种:系统性变化和非系统性变化。作为母语运用基础的语言能力含有可变规则(variable rules)或交叉语法(overlapping grammars),其系统性和变化性是可以调和的。大部分有关可变性的研究关注的是中介语的结构变化特征,是一种动态的二语习得观。由于可变论不是建立在强有力的语言学理论之上,其解释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的局限。

与国外相同领域的研究相比,我国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比较窄。研究界近二十年的成果类型显示,大部分研究从教育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教学角度探讨比较实际的问题,而采用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很少。根据《中国外语教学环境下的二语习得研究》(戴炜栋主编,2006,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提供的1984-2004年度二语习得研究论文索引信息,只有少数论文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大部分论文探讨的是二语习得者的个体因素、学习策略、交际策略,二语习得者的外部因素,语音习得、词汇习得、差错分析、习得顺序、中介语僵化与变异,以及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等;即使有的论文涉及中介语语言本体,其语言学理论背景也比较弱。这一现状与研究者的教育背景、研究环境和图书资料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帮助二语习得方向的研究生、研读者拓宽研究视野,增进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了解,使我们的研究与国外接轨。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引进如此多的二语习得专著和文集，是为二语习得研究者和爱好者办了一件积功积德的善事。

这本由 Gass 和 Schachter 主编的《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初版于 1989 年，虽然成书时间不短，但是内容经典，影响很大，至今仍广为引用，对现在的研究依然很有启发，是研习二语习得的必读书。该书为有志于研习二语习得理论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思路，有助于读者了解以语言学为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全书分五部分：语言习得理论篇、句法篇、语义/语用篇、词汇篇和音系篇。句法篇部分是该书的重点，由四章构成，其余每个部分两章。

编者 Gass 和 Schachter 在导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编著目的是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二语习得问题，尤其注重二语习得与语言学理论之间的潜在关系。尽管所选文章代表不同的观点、展示不同语言学理论，但是全都注重将二语习得研究建立在揭示语言本质的理论框架之上。

语言理论与二语习得理论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语言理论指导并规约二语习得研究假设的提出与检验；反过来，二语习得的具体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又可以用来支持或反驳某些理论模式。语言理论与一语习得理论的双向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二者都在试图解答语言的可学性问题（learnability）。语言学研究需要解答以下三个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是如何被习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被应用的（Chomsky, 1991）。语言学理论必须回答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语言习得理论则必须回答语言知识如何被习得。“可学性”既是一条评价具体语法理论模型的标准，也是语言习得理论必须解答的难题。语言理论提出的成人语法必须与儿童语言习得揭示的事实和规律保持一致，语言学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双向互动关系。

Gass 和 Schachter 认为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学理论存在同样的关系。但是，二语习得应该得到语言学理论指导这一思想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对语言学理论概念的应用显得比较零散随意。在她们看来，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二语习得界自身的研究兴趣所致；二是来自二语习得界之外对二语习得研究内涵的误解。二语习得研究关心的问题有：1）第二语言被习得的内容是什么；2）第二语言不被习得的内容是什么；3）获得（得不到）那种知识的机制是什么；

4) 根据习得的成败对习得过程进行解释 (Gass & Schachter, 1989: 3)。二语习得早期的研究注重从教学的角度探讨二语习得问题, 以求增进对课堂教学的理解, 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不一定直接探索教学问题, 但不等于说从事这一角度研究的学者认为二语习得不应该关心教学问题或者认为与二语习得有关的教学问题没有研究价值。

以语言学理论作指导的二语习得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非应用型学科, 关注的问题与一语习得研究相同, 因此语法理论制约着二语习得理论。Gass 和 Schachter 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语言理论与二语习得理论的关系, 一方面涉及语言理论对二语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涉及应用二语习得数据检验并发展语言理论 (1989: 4)。

如果我们不知道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就不可能弄清楚二语习得过程。语言习得者具有的复杂而抽象的语言知识体系明显包含没有通过直接的教学获得的内容, 语言运用过程中常见具有创造性的语句, 因此, 我们在研究语言的内在属性时不能仅看语言运用显示出来的表面现象。二语习得研究仅靠观察归纳习得者的语言运用很难了解习得过程及中介语知识表征, 二语习得研究必须解释学习者如何在接触表层结构形式的情况下获得抽象的二语知识并形成知识表征, 因而二语习得研究必须探讨普遍语法的可及性问题。既然二语习得理论也是关于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论, 就应该将其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理论结合起来, 用二语习得研究获得的数据检验语言理论的有效性, 不能有效解释二语习得数据的语言理论就算不上是好理论。实证研究必须与理论研究协调一致, 并且具有证伪理论模式的作用, 从这一角度看, 二语习得研究对语言学理论建设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这正是二语习得与语言学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就是 Gass 和 Schachter 所说的“共生”“互利”关系。

《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学视角》第一部分的两位作者 Gregg 和 Bley - Vroman 从生成语法角度阐述了二语习得理论, 前者运用 Chomsky 的语言学理论概念 (如语言能力、语言运用、自主性、模块性) 分析二语习得理论建设的要素, 后者则具体论述成人二语习得是否通达普遍语法 (have access to Universal Grammar) 的问题。所谓语言习得, 包含两个重要概念, 首先是“语言”, 然后才是“习

得”，没有“语言理论”的支撑，“习得”理论可能是空架子。Gregg 认为，Chomsky 的生成语法理论最能给二语习得以启发，分析第二语言的知识与分析第一语言的知识一样，也必须区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就是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知识，而二语运用中的可变性不是有关语言能力的理论所探讨的内容，不知道“知识”为何物就不可能探索“知识”的习得。语言知识包含一些天赋内容（innate），包含我们从不表达出来的语言知识，如有关歧解（ambiguity）的知识、表达式的照应关系、有关可能的语句和不可能语句的知识。这些仅靠观察语言行为或语言运用是不够的。Gregg 同时又指出，他并不是说不应该研究学习者的语言行为，而是这些行为不应该成为语言习得理论的目标。Gregg 用 Chomsky 的理论概念分析批判了某些二语习得具体理论，如 Tarone（1984）和 Ellis（1985）的可变语言能力模式（Variable Competence Model），并且指出 Ellis 混淆并误用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概念，导致了“语言能力异质”（heterogeneous competence）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Tarone 的语言能力连续体（capability continuum）在 Gregg 眼中也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根据 Tarone 的界定，capability 是二语学习者正常语言行为之本，对其起指导作用，是由语言风格构成的连续体（a continuum of styles），Gregg 认为这个定义没有讲清楚什么是 capability 和 style。但是，Tarone 却认为自己的定义与生成语法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分一样区分了潜在的中介语能力和中介语行为。研究语言能力的理论与研究语言运用的理论有本质区别：前者的目标是揭示语言的心理表征而不是观察到的行为；构建理论的证据也不相同（如直觉知识），因而可以采用演绎的方式论证；后者通常采用归纳法，将观察到的语言运用事实进行概括。二语习得研究中广为应用的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包含（语言知识构成的）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内容，如语用能力、策略能力，这类研究往往将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和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ability）混为一谈。Gregg 提出二语习得也需要一种形式化的语言理论。

Bley-Vroman 关于二语习得逻辑问题的讨论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二语习得的理论建设。他虽然承认二语习得的逻辑问题与儿童一语习得相同，但是二者存在区别。所谓“逻辑问题”需要解答的是，